

【名家背影】

□傅国涌

吴宓先生的悲痛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尔什维主义。

1923年7月6日，吴宓先生在东南大学写信给哈佛大学的业师白璧德教授：“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他写信前的这段时间，中国从北到南发生了许多事情，确实内外交困，危机重重，不止是严峻的政治危机而已。5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民大会主张推倒张内阁。5月4日，北京学生借“五四”纪念日再次发起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运动，并结队捣毁了彭家住宅。彭向法庭指控是北大教职员蒋梦麟等主使，蒋梦麟等则控告彭诬陷。5月5日，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劫了一辆北上的列车，三百多名中外旅客成为抱犊崮的人质，震惊中外，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以招安土匪而了结。6月6日，张内阁与黎元洪的总统府因权限之争，全体总辞职。自6月7日起，在直系军阀曹锟的唆使下，北京军警借口内阁已辞，饷项无人负责，开始向总统府索饷。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驻外各使联合通电：政府再不给费，将于7月1日一齐下旗回国。10日，北京警察仍在索饷，而且有人雇公民团驱黎出京。到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摄政内阁暂时主政，政局大变，许多国会议员出京。掌握枪杆子的曹锟将要运作上台。其间，各地土匪猖獗，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绑架男女百余，其中有意大利传教士梅神父，向汉口官吏索赎百万元。就在吴宓写信的前一天，7月5日，广东广九铁路上土匪劫持了七十多名乘客。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尔什维主义，认为这些激进主义的选择忽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只会把古老民族带上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路。多年的留学生涯并没有使他成为西方价值的膜拜者，虽然他的新人文主义理想也来自老师白璧德。他向往“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渴望从“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着手，让中国摆脱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危机。白璧德在哈佛的熏陶赋予了他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他办《学衡》，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努力。他虽深知这样一本文明气息的刊物作用微弱，但他对此抱有信心，希望能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当时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

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丧失。这在他1925年12月30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前问题及令人失望的现象，根源和缘由不仅仅是学生们不守法，而是我们人民一种普遍的道德衰退。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以前真正的中国全然不同。”他的这一判断是否合乎实情，诚然还可以商榷，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关切的不是权力的纷争、政治秩序的重整，而是国人道德品性上的堕落，他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的工作。这是他选定的书生报国之路。

一年后，他再次给白璧德教授写信说：“请原谅我对您再次讲述我们正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衰亡的危机中。中国已腐败到极点，但个人的失望和不幸相对于国家的灾难与普遍的黑暗而言微不足道。”

1894年出生的吴宓，在他的人生经验中，1923年前后耳闻目睹的已是腐败的极点，毕竟他尚未见识更深、更广的腐败。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也少有如此明白地表达他内心的失望与悲痛，但他一生的关怀大致上可以概括在这些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坚持编了十二年的《学衡》、他为《大公报》主编的《文艺副刊》以及他在清华、西南联大课堂上长期讲述的课程，都可以看作是他对这种悲痛的回应。他始终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这一思路他一直没有放弃，1937年春天，他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请去欧洲旅行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认真研究道德哲学，考察研究欧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别是他们个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动机，为写作《文学与人生》做准备，“它将体现历史和传统的智慧，但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实际生活的现实及环境。”几个月后，抗战爆发，欧洲之行成了泡影，但他的“文学与人生”课曾吸引了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百年寻梦》等书）

史景迁是以研究清史为主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其名字在中国被广大读者所熟悉。不过，史景迁有一个严重的弱项，那就是对清朝军制、军史的了解很苍白，一旦涉及跟军事有关的话题，就很容易出破绽。比如，在他的代表作之一《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中说道：“正规的八旗军不能打败太平天国。”实际上，跟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还是绿营。纵观他的整个叙述，可以认定他对绿营基本属于一无所知，对八旗他也没有什么了解。史景迁有《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专著，对太平天国的对手只是含混地称为“清军”。

满清得天下诚然靠八旗这个根本，但入关后打天下主要出力的还是汉人，是一部分汉人冲在前面帮满人杀汉人而荡平天下，这部分汉人在军制中被称为绿营。当天下底定，特别是镇压三藩之乱后，绿营的战斗力也过了高峰期。不过，之后帮满人镇压天下的，主要还是绿营。这当中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朝廷既需要依靠绿营统治天下，又不能使绿营的战斗力强大，怎么办呢？

朝廷使用了很吊诡的办法。他们把八旗主力集中以保持最高水平战斗力，以使任何部分的绿

【读史札记】

史景迁不了解清朝军事

□顾则徐

营都没有能力可以较量；再把一部分八旗力量分散驻扎各地，实际上派了监视、督战绿营的用场。绿营则尽量分散驻扎，每股绿营的兵力都很弱小，并且不能随意调动，当有重大作战需要时，才由皇帝下令进行集中，作战任务一结束再予分散。这样，只要汉人没有普遍团结一致，每一部分的绿营就都不会是八旗的对手，即使发生大规模造反，也比较容易被八旗主力各个击破以镇压。再加以装备、军饷等要素对八旗鲜明倾斜，尽管八旗跟绿营一样走向衰败、腐化，但比较而言，战斗力还是保持着优势。

绿营分散驻扎、临时集中的特点，决定了其面对较大规模战争需要时，就会缺乏战斗力和机动性。这正是太平天国突然大发展的背景。太平天国最初在广西起事时，并不比以往发生过的很多次暴动更有规模和威胁，清廷调集的绿营武装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对付这种一再发生的暴动也足够了。数千太平天国人群被围困，几乎是要再次重复暴动被绿营镇压的故事了，但获取太平天国实际决策权的杨秀清是个天才，他把壮大暴动力量的威胁手段在中国皇朝史中使用到了极致，采取了从小路突袭，不顾一切顺水东进的策略。太平天国突破包围进入湖南，攻不下长沙就突然转攻武昌，然后万舸竟发，攻占了毫无防备的江宁。这是超水平的长征，三年之间，太平天国从二千多人变成了一百万人左右。这样的发展策略，是笨拙的绿营所无法遏制的。

不是八旗武装跟太平天国打，而是绿营跟太平天国打，这是史景迁的知识盲点。当然，在南方跟太平天国作战的武装中，并非没有八旗兵力，但主要的武装是绿营。而且也不能因为绿营最终失败就可以轻易认为它没有成就，当太平天国占据江宁忽然壮大后，自身也需要进行整编和政权建设，绿营就有了喘息、集中的时间和机会。当绿营得到集中，尽管不能占据优势，但也能跟太平天国进行相持，困住太平天国，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正因为绿营争取到了时间，各地团练武装及湘军才有了组建、整合和军队化建设的时间。从1851年至1860年，绿营一直是对付太平天国的主力，1853年后湘军得以发展是有这样一个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当1860年绿营的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天国打破，得到成长的勇营武装才可以顺势应时取代绿营成为主力。

当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后试图向北发展，所面对的对手是以八旗为主力加上绿营、团练，这时候，不是“正规”的八旗军不能打败太平天国，而是八旗军并不困难地全歼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绿营主要是步兵，更适合南方山地作战和水战，八旗主要是骑兵，在北方占尽优势。所以，当以步兵为主的太平天国北伐，所遇到的是优势劲敌。

看清朝乃至民国时候的中国军事，要分外战、内战，中国军队的所谓强弱，外战和内战完全是两回事。僧格林沁骑兵虽然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但进行内战的话，在北方依然最强大的。曾国藩并非不想搞骑兵，而是实在搞不了，既缺乏人才，又难以解决经费，养骑兵的费用是养步兵的数倍。当僧格林沁战死后，曾国藩、李鸿章北上，他们一再上奏解释自己的勇营步兵到北方作战时不具备僧格林沁骑兵那种大开大合、快速机动的强悍战斗力，要采用笨办法搞寨堡体系，通过挤压来围剿流窜的捻军。僧格林沁死了，同治皇帝无所依靠，只能答应曾国藩、李鸿章的笨办法。

就太平天国、捻军问题来说，那正好是世界军事的现代化转折期，但也正是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转折期。绿营已经把太平天国损耗到了衰落状态，偏偏太平天国回光返照，让绿营吃了个江南大营被击破的败仗，满清只能让曾国藩的湘军来接盘。八旗骑兵已经把捻军打击到了没有出路、逃无可逃的地步，偏偏僧格林沁意外战死，失去强有力的统帅，满清只能再让曾国藩、李鸿章北上接盘。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一路西去进攻的左宗棠才更显真英雄底色。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往事如烟】

□刘增人

养马岛旧事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

好像是1988年的暑假吧，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在烟台举办学术研讨会，由烟台师院承办。会长田本相先生给我发了个通知，我立马高高兴兴去了烟台。会议开幕式一举行完，即刻就“移师”养马岛了，我们大都高兴得不行。烟台谁没有到过？养马岛可是久闻大名，无缘一面啊。但真正到了，却也不免略有失落之感。那时的养马岛，虽然自然景色不错，但草创伊始，除去孤零零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四周好像什么建筑也没有，连大树也没有几棵。可会议还是开得有声有色，应该说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讨。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都带着认真撰写的论文。会议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的浓烈，和后来的一些所谓的学术会议比较起来，实在太令人怀念。

第二天讨论会的下午，发言起了争执。年长一辈的资深学者和年轻一代的新锐学人在戏剧史的具体评价上分歧严重。老学者们火气很大，用词特别激烈；年轻人也不甘下风，据理力争，但到底是“师道尊严”的观念那时还不曾扫地以尽，终于以老学者“做总结”，年轻的硕士、博士们“受批评”结束。会后，两代人还是各自心气难平，言辞与面色都显得冷冽生疏一些。

从年龄论，我与年轻人比较接近；但从读书的年代看，又分明更接近老学者——于是，在这场主要是学术但又分明夹杂着意气的“论争”中，我倒不自觉地成了那则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的“蝙蝠”。晚饭后，老学者们好像大都比较疲累，大厅及楼外，都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还是年轻人精力旺盛，三三两两在散

步、交谈、吸烟、说笑……无意中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计谋”，而且，第二天凌晨，居然真个被“实施”：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得宾馆四周响起一片“样板戏”的声响，有的当然有板有眼，颇似李玉和、杨子荣的腔调，但多数不过是逼尖了嗓子干号，李铁梅不像李铁梅，阿庆嫂不像阿庆嫂，直听得人们陷落进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年代！这一招果然奏效，上午的会议气氛立马变了，昨天还生龙活虎的老专家们好像大都打蔫儿了，一位位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下午略有缓和，但终究未能完全恢复初始的氛围。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

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

平心而论，我在“文革”中并没有特别悲惨的遭际。首先，我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批斗倒也批过一小拨儿，非常短暂。那是“文革”刚刚开始，此前，我是班主任一枚。学校的“四清”工作组严厉各班主任提交学生“左、中、右”的名单。我找不到中和右，就把班里的党员、干部作为“左派”学生上交。这份名单被查抄出来，我就有了把“革命学生”打成“右派”的滔天罪恶——因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造反派学生要我低头，我低了，要我认罪，我认了。只是他们一定要我自己“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我迟迟不敢应答。于是有满满三教室的大字报和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语贴出来，说是要“坚决彻底打掉”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但很快就不打

了……我坦白，其实在“文革”中，我也并非十年如一日地驯良，也有过一次对当时的领导大不敬的孟浪行为。那是1966年冬，我们出入必经的教研组门口，迎面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大多数字体连教古汉语的同事都辨认不出，只有不到半数的字可以辨识：完全是一派极其下流污秽的话语，诟骂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师，其用语之卑劣，出于几乎所有人的想象！署名是“捉鳌队”。我实在想不明白，一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怎么能够激活此类人物内心蕴藏已久的那么恶劣的内容！在这样的铁蹄下苟活，又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即使还喘着气，又有什么意思？我于是偷偷用浓浓的墨笔把那个“捉”字涂抹掉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